

民進黨火爆人物 朱高正論台灣自由

李敖編



民進黨火爆人物

李敖編

朱高正論台灣自由

(代序)

瞧！這個「麻煩」人物

楊憲宏

——朱高正專訪

訪問朱高正，是來自於一種感覺與觀察，我覺得一個臺大法律系畢業，西德波昂大學的哲學博士，會在立法院一開議便搞得天翻地覆，應該有他的道理。

朱高正很能自圓其說，確實是受過嚴格哲學訓練的人。他說話時很狂，口氣很逼人，很得意。有時會忘形，所以有時表現出來的身體語言不免自大、輕佻、不謙虛；不一定會討人喜歡。他似乎很合古代「必也狂狷乎」所指的狂。

這次訪問，是以「爲他鋪設一條社會定位底線」爲目的，因此放棄原先想問得比較critical的策略。因爲問得太尖銳，反而會使他無法以原形與讀者相見。太尖銳的問題，不免要使他批評國民黨，或批評民進黨同僚，我覺得那樣的主題不是這篇訪談的目的。

我希望他在這次訪談裏所談的若干理念，在未來，任何人都可以用來檢驗他。

楊：請問，你是不是民主進步黨黨員？

朱：是

楊：你是否已經決定這一輩子都要當民主進步黨黨員了？

朱：當然是這樣。

楊：爲什麼？

朱：一名政治人物，應該有他的政治信仰。只要認同民主進步黨的黨章黨綱，而黨綱黨章不變，我一生就是民進黨員。

楊：假如民進黨的黨綱、黨章發生變化了，你還是一樣的想法嗎？

朱：沒錯，我仍然這麼想。我說個故事給你聽。一九八三年施密特所屬的社民黨（SPD）推翻施密特掌權時代的國防概念，那時在社民黨的黨員代表大會上記者問施密特，他是否會離開他的黨，施密特回答的話很感動我。

施密特說：「我從年輕時代便加入SPD，社會民主運動是我一生奮鬥的目標。雖然我的黨一時被迷惑了，但這並不構成我離開的理由，我將繼續努力導它入正軌。」

入黨、退黨都是十分嚴肅的課題。我當然同意，每個人都有做「相反決定」的自由，但如同入黨的決定是神聖的一般，退黨也不能隨便決定。

楊：好，我們進入主題。今年，二月二十四日，你在行政院長俞國華施政報告當天，在議場內與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周書府打了一架，電視上都播出來了，這件事，你有什麼說明？

朱：並沒有打架這回事，我不過是正當防衛罷了，我當時是向主席提出程序問題。令人遺憾的是，倪文亞主席也受到沈重壓力，因為當時離預定施政報告時間已遲了兩小時十多分鐘。

誰有最高決策權？

倪文亞主席並未尊重我的權利。雖然事前許勝發委員有來協調行政院長任期問題，不過我要提的並不是這個。而是，行政院長與國家安全會議，今天那個有真正最高的政治決策權？依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五十三條，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。但今天的行政院卻成了在國家安全會議底下的一個二級行政機關。

最高行政機關向最高立法機關負責，這是一個多麼嚴肅的事情。這也就是我競選時十八條政見的第八條：廢除國家安全會議，使行政院能真正向立法院負責。

根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第六項，國家安全會議是以總統為主席。因此，如果國家安全會議與行政院發生爭議時，最終決定權在總統。

國家安全會議剛通過七十六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案，交給行政院長來執行。因此，要行政

院長來立法院施政報告，怎麼可能要求他要為政策負責？這那裏符合責任政治的基本精神呢？現在的政治革新，根本是由蔣經國總統在後面策動的，我認為，最好他辭總統，然後以多數黨領袖出任行政院長。

我的程序問題就是這個。

但那時很亂，沒人聽見我說話，我走向主席臺前向俞國華說：「你不够格來報告。」

李宗仁、黃河清、周書府三個人上前來拉我下來，幸好我腳步站得穩。由於我那天穿的是義大利料子的西裝，袖子面很滑，他們抓不住我，因此用力很猛。當時我並不知道是誰在拉我，我根本不認得他是誰。立法院那麼多委員，我剛來還認識不完，何況周書府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對他已經很客氣，讓他三招，我才把他摔倒。他用腳踢我，我沒有還擊，他連三招都用腳，第四招我才出手。

我只不過做適度的正當防禦，是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……

楊：在電視新聞上，大家看見的是你在與人打架……

朱：國民黨的大眾傳播工具故意要醜化我，這根本是「反教育」。他們不把背後的嚴肅

課題拿出來討論……

楊：你不能等施政報告後質詢时才提嗎？

朱：不能，當然不能。等他報告完了還提什麼，這是程序問題。要提，只有等下一次，他再來施政報告，我會再提出來。

楊：如果下次又是一樣，你還提嗎？

朱：那有什麼辦法？作爲一名反對黨的國會議員，經常必須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盡我們的責任。其實每個步驟結果早已清楚，講其實也沒有用，他們總是可以多數來運作：但我要讓他們曉得，今天不解決，明天還是要解決的。

楊：你站到臺前去比畫時，有沒有料到結果是這樣？

朱：沒有，完全不知道會是這種場面。

楊：有人認爲你造成這種局面，有損立法院的尊嚴：

爲立法院爭尊嚴

朱：在現行體制下，目前的立法院本來就沒有尊嚴。它連一個縣議會對縣政府、甚至鄉民代表對鄉公所的尊嚴都不如。國會不全面改選，這種尊嚴就永遠不如。我們民主進步黨在這次選舉拿到了百分之廿三的選票，卻只佔立法院三百廿席中的十三席，即百分之四的席位而已。一千九百萬納稅人選出來的立法委員，沒辦法爲納稅人做出相對應的變革。而蔣經國總

統一連串的改革，立法院也沒辦法相對的因應。

我這麼做其實是爲國會爭取、重建尊嚴。

楊：但你怎麼解釋打架事件呢？

朱：好罷，就算是打架也好，但這樣總比在臺北街頭大家打破頭好啊！今天即使我受了重傷，也比人民直接在街頭衝突好。我希望人民可以體會這樣的意義。

楊：人民從電視上能體會嗎？

朱：（沈默一下）這次事情後，我收到三千多封信指責我，信的內容千篇一律，他們全然對事實無知。我很想與他們溝通，他們留下的無一是真實地址，電話也都不是真的。

楊：你覺得媒體……

朱：電視醜化我，其實他們不醜化我才奇怪。「青年日報」做得最明顯，事件當天他們新聞登得不多，倒是後來批鬥我的有十九篇……。這一次我覺得「聯合報」要比「中國時報」還要自由，「聯合報」寫出來正面意義的東西。

楊：你這算不算是「作秀」心態，或是你認爲「作秀」是不是一定不好？

朱：國民黨在醜化我。我去年九月廿七日演講，國民黨出動鎮暴部隊四千多人，十幾輛裝甲車圍我。我不屈服。我從未主動挑釁，我行爲一向正當。

我個人對政治壓根兒不感興趣。

在我身邊的人都可證明，我表裏一致，言行一致。我怎會是在「作秀」呢？

我只不過堅持一點罷了。

楊：你能不能說一點你的經歷？

朱：我一九五四年生，三十二歲（虛歲是三十四歲）。臺大法律系畢業。在大學時代我的輔系是哲學系西洋哲學組。因此我留德，在波昂大學唸得哲學博士。波昂大學是世界研究康德的中心。

楊：那你的博士論文是什麼？

朱：康德的人權及公民權學說。

楊：什麼時候回臺灣的？

朱：一九八五年九月。

朱：爲什麼會去選立法委員？

朱：我到去年八月都還沒想到——

楊：那爲什麼？

朱：後來我只用十個禮拜去準備。其實我對參政沒有興趣。

楊：爲什麼？

朱：有些事情已够清楚，還要與那些人辯，真是窮極無聊。我在哲學方面可以有很好的成就，我的博士論文在德國獲最高的評價，其實我的希望是做哲學家。

楊：再多談一些……

朱：我不參政則已，參政的話，一定要爲臺灣政界帶入一些新力量、新因素。這是我行爲處世的邏輯。

我不能讓世界白白少一個哲學家朱高正。

我要讓立法院有了我朱高正就不一樣。而且我無欲則剛。我接觸現實政治始於爲尤清助選臺北縣長，後來在臺北縣黨外公政會分會服務，辦〈自由臺灣〉雜誌、參選、當選立法委員……我從未爲自己的政治利益做任何事。在選民進黨中央委員時，我大概是極少數不去拉票的人之一。

楊：你還是沒有回答，既然你對政治沒興趣，爲什麼又參選？

從學術到參選

朱：我回國想做學術研究。臺灣卻連學術自由研究都不可得。青輔會不爲我推薦，東吳

大學原已發給我專任聘書，卻又要求我隨後補送青輔會推薦書。許多人勸我聘書能拿到了就好了，我卻覺得，我憑實力拿到這份工作，爲什麼要推薦書。就把專任聘書寄回去。後來連兼任也不給了。

楊：爲什麼？你知道什麼原因嗎？

朱：我在海外的記錄吧！

楊：所以參選了？

朱：我參選回到雲嘉南，目的不在當選。我想推展民主運動的理念。因此在選舉期間，如果一個行動是民主運動理念的第一要務，卻可能與當選相牴觸，我寧願去做，得到不當選的結果。

楊：你覺得，民進黨的人怎麼看你？

朱：（要求重複講一次問題）他們會認爲我是一個麻煩的人物。

我的意見一向很多，又很堅持。對我自己的理想，我相當堅持。對當權人物來說，也許我很麻煩。但我會是民主進步黨進步的原動力

楊：你覺得，國民黨的人怎麼看你這人？

朱：麻煩人物。我可能是今天在臺灣發動羣眾運動最具潛力的人。從演講次數、參與社

會運動的頻率，都可看出來。他們認為我精力過人，很頭大。辦演講，別人辦很費力，我不費力。中午起意，晚上就可以辦成。我一個人講兩小時是平常事。我有講不完的話題，而且演講內容不重複。

楊：並不是所有的羣眾都喜歡你，譬如說，那天在立法院門口與你衝突的那羣人？

朱：全民愛國會那羣人……他們其實很可憐。我要招三、五千人來是十分容易的事，只要前晚辦個演講，一宣佈，隔天立法院門口就有那麼多人。他們來圍我的隔天，單雲林就有十輛遊覽車要上來，可是我阻止他們。我不能讓國民黨的極右派有好的藉口。

全民愛國會那些人，我還可以讓他們兩次，以後就不客氣了。他們要公開辯論，我隨時歡迎。

楊：在羣眾歡呼聲、激情情況下，你會不會迷失自己？

朱：我很尊敬羣眾。以憤怒來帶領羣眾是法西斯。以喜悅來帶領羣眾是宗教。我是以理性來帶領我所尊敬的羣眾。

有一名家鄉的老前輩告訴我：「聽朱高正的演講，笨人可以變聰明。」因為我是用論證的方式來進行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潛力。

我反對用叫囂、了無新意的口號。我是個十分能保持冷靜的人。

楊：既然你的基本哲學是「對參政沒興趣」，那麼你是不是隨時準備歸隱山林？

朱：我其實認為，根本不必當國會議員。政治改革其實是十分浮面的東西，即使國民黨今天有百分之百的誠意來改革，十年內也未必有大成就。

社會行為模式多年來已經定型，因此文化意識的覺醒才是最重要的。現階段，立法院並不重要，社會運動才是更重要的事。我每一場演講都向聽眾每人募十元，目的是要用羣眾的力量來支持羣眾運動。

我不會以政治為我一生的歷程。

我的競選政見第一條便是在這三年內促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，這是我的責任。目標一達成，多的是人可以來當國會議員。

我要好好做完這一任。

文化覺醒更重要

楊：你認為文化覺醒更重要：那是什麼？

朱：有一回臺南善化糖廠的員工向我投訴，廠方不守《勞基法》，每天要他們工作十一小時，要我為他們爭權益。我問他們，抗議過沒有？努力爭權益了沒有？結果答案都是否定

的。我告訴他們：「那你活該。」一個人已經知道自己有什麼權益，也意識到自己的權益被侵害，卻不去爭，這樣的人就沒有權利去要求別人爲他爭權益。我教他們如何去與廠方談判，說如果不答應，朱高正就要來了。結果，他們談成了。

楊：你變成資本家害怕的人物。

朱：他不照規矩來，就會害怕。

楊：那你贊成民眾自力救濟囉？

朱：在法的程序未完成之前，我反對自力救濟。不得已的情況下我贊成。我一向反對暴力。

楊：立法委員的位置有助於推展你的想法？

朱：是有某種程度的幫助。臺灣的老百姓，連立法委員與官員都分不清楚。反正他們心中覺得，你很大就對了。這使我與他們溝通上更容易。

楊：那立法委員的位置有沒有保護你的效果呢？

朱：我覺得沒有保護效果，我做得愈大，他們愈刺激，可能使我更危險。

楊：那當立法委員有何用？

朱：立法委員是沒有什麼用。我來立法院是要搞得立法院天翻地覆、上下震動、左右搖

擺、崩潰，來一次政治地殼大變動。改革立法院的體質。我常用歷史觀點來想：功成不必在我，做到了就好。

楊：你對媒體有什麼想法？

朱：我早已放棄媒體。自從在南部參選以來，國民黨便全面封殺我。我一共辦了近兩百場演講，每場都用最原始的辦法，用宣傳車上街放送消息。我一直堅持這原則。在這不自由的环境，媒體已受相當大的扭曲。做為一名公眾人物，我不在乎他們醜化我，其實他們不醜化我，我才覺得奇怪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必須常常辦活動。

楊：國民黨已喊出改革，假如他們將來學習西德SPD執政時，不斷吸收反對黨綠黨的主張與黨綱，使反對黨的聲音無法擴大，你覺得民進黨有無危機？

朱：這將對民進黨造成強大的壓力。民進黨必須一直提升自己的問政品質。在短期內，對民進黨確是危機，但就長期發展看，這是政黨政治的良性競爭。目前民進黨體質仍很弱。楊：民進黨長久以來，一直只有政治意識型態的實力，在談政治以外的文化、環境、社會的課題時，始終沒有拿出成績來……

朱：你不能這樣苛求民進黨。事實上，你也不能如此來苛求國民黨。我們這地方，還沒達到那個階段，也沒達到那個境界。

我告訴你，在我的理想中，我有法治國、社會國、文化國的想法，我們現在努力的只有前兩者（法治國、社會國），也就是要保證國家、政府不濫用公權力；社會經濟弱者不受到剝削。但你知道，這境界是很消極的，你躲在家裏一事無成，只要不侵犯他人也算是達到境界，知不知道？想想看，這樣能說已經達到人格自由的充分發展了嗎？

文化國是指人民有不斷的創作，藝術的、文化的，道德理想的、整個國家文化生活形成共同體的理想。要讓人人能積極創造。在學校，在大眾媒體方面鼓勵，卻又不可涉嫌操縱。

楊：爲什麼不能苛求他們？

朱：政治上並不迫切。這些境界，目前對我們來說是太奢侈了，我們還沒有條件。會重視這個問題的人太少。就連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也不能有這方面的包涵，裏面所記載有關的條文，粗淺得可憐。

楊：你是說憲法不足？

朱：對，我們要有「文化憲章」。不過從國家法思想發展程序來看，這是後資本主義時代的事。你看，一七八九年，全世界才實現「法治國」；「社會國」在一九一九年才出現；「文化國」現在才開始受重視。我們則還停留在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噩夢裏。依「文化國」理念，人不只是歷史文化的產物，還要是創造文化的主體。

人格主義的自由主義者

楊：你怎麼定位你自己，在這個時代？

朱：我是個人格主義的自由主義者 (Personalistic liberalist)。我很拼、很衝，但我從不打人，只要我認為對，就往前衝，挨打也不後退。我不是猛得打人的人，而是猛得挨揍的人。我堅持非暴力的反抗路線。

楊：你覺得大家會怎樣定位你？

朱：看遠一點，公道自在人心。

楊：再過幾年後，你是否仍保持目前的想法，你今天說的，到時都可以檢驗嗎？

朱：你不要去猜那些事情。對一個哲學家來說，在他的精神世界中，是隨時保持自我批評的。

康德有兩段話是我最喜歡的，他說：「國王變成哲學家，或哲學家變成國王，這種柏拉圖式的哲王理想，不但不值得期待，甚至不應該去期待，因為權力的佔有不可避免地會腐蝕理性的自由判斷。」

「經由革命固然可以推翻個人的專恣、暴虐，但新的成見取代舊有的成見，會繼續宰控